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 代表大会”日记

[意] 维·维达利 著



東方出版社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 代表大会”日记

[意] 维·维达利 著

王德树 译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意]维·维达利著
王德树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6
(历史档案丛书)

ISBN 7-5060-2382-2

I. 苏… II. ①维…②王… III. 苏联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D35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3577 号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

“SULIAN GONGCHANDANG DI ERSHI CI DAIBIAO DAHUI” RIJI

[意]维·维达利 著 王德树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京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375

字数:208 千字 印数:8000 册

ISBN 7-5060-2382-2 定价:18.00 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 | |
|---|-----------|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 | |
| (一九五六年二月) | 维·维达利 (1) |
| 对“苏共二十大”的思考(一九五六年七月) | (125) |
|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 (135) |
| 结束语 | (172) |
| | |
| 我们党的政治组织(陶里亚蒂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 会议上的讲话) | (180) |
|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致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 遗孀的信 | (194) |
| | |
| 作者注释 | (200) |
| 人物简介 | (202) |
| | |
| 附 录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 (225) |

“苏联共产党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

(一九五六年二月)

维·维达利^①

一九五六年二月九日

今天就要启程了，我感到心神不安。昨晚，彻夜未眠，心里在想我是否应该去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到那里去势必要遇到许多事情：重新审察各种见解，碰上不友好的面孔，回答使人棘手的问题，打消各种疑虑。我想，我不愿意去是由于有一种内在的（也是私人的）隐忧一直在我内心深处郁积，像影子一样紧紧地跟着我。

天气很冷，雪花在飞舞。我还因接到妻子的来信而担忧，她相信自己是病了。

握手道别以后，我们就迎着暴风雪出发了。我们不得不两次停下汽车，因为防滑链不知是没有捆好还是太旧而断开了。一切处在混乱之中，宛如大海和天空浑然一体。道路已看不清

^① 维·维达利生于的里雅斯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入意共。曾在意大利和德国因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而多次被捕。1923年非法进入美国，1927年因“颠覆活动”被驱逐出境，流亡欧洲和苏联。1938年在西班牙保卫马德里战斗中负重伤，此后在墨西哥度过最后十年流亡生活。1949年回欧洲后，成为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共产党领导人。本书中的两部日记都是在该党1958年重新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之前写的。

边缘，我们仿佛行驶在白雪皑皑的大平原上。

我们来到了乌迪内，火车要晚点近两个小时，我们只好耐心等待。车站里寒气袭人。谁也弄不清列车到达的准确时间。当你问车站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只是耸耸肩。

我这一辈子见过多少车站啊！我几乎觉得，直到几年以前的整个一生中，我遇见的都是接二连三的车站、启程和到达，而所有的车站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同样的人群来来往往，四处奔忙。

火车终于来了。在因电灯坏了而陷于一片漆黑的最后一节车厢里，我找到了斯科奇马罗和来自热那亚党组织的领导人布格利阿尼。他们担心我会来迟，因此已经在考虑将我的护照留在边界，把希望寄托在我能好自为之上。

二月十日

天气很冷，我睡得不好。下了一夜的雪，而且雪花仍在向白茫茫的原野上飘落。我们到达了塞莫林山口。这里原来是苏联的第一座检查站，而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战争纪念碑也被大雪覆盖着。

火车没再晚点，我们于上午抵达维也纳。对于我们这些来自的里雅斯特的人来说，维也纳是亲切迷人的。我们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我们熟悉维也纳的街道、广场和纪念碑。为了解奥地利和研究奥地利历史的老前辈来说，情况尤其是这样。多么可怜的维也纳！它真像是一颗从巨大身躯上砍下的头颅，如今被用棍子扦插在一个弱小而佝偻的躯体上^①，让人们再也

^① 维也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四国分区占领，直到1955年苏联政府撤回其对奥地利条约草案的反对意见后，维也纳才终止了四国占领，使奥地利成为统一的永久中立国。——译注

联想不起它先前的光辉形象了。

在旅馆里，像在这里所有的旅馆、饭店和商店一样，有会讲意大利语的人，他们到过的里雅斯特，想对我们表示诚挚的欢迎。

我们吃完饭出去散步。下午，我们去卡伦贝格，从这座小山可以俯瞰全城，我们可以从山上一览无遗地观赏白雪皑皑的景色。每当没有下雪的时候，尤其是春天和秋天里，维也纳的壮丽景色和周围的乡村可以尽收眼底，从这里还可以看到一片景色秀丽的树林，每到星期日，维也纳人就在这片树林里纵情地度过他们那无忧无虑的一天。

晚上，我们前往拉纳赫剧场，这是一座古老而以丰富多彩的演出和评比活动著称的剧院。我们置身于也来这里消遣的观众中，过得十分愉快。反对苏联和反对英美的笑料激起阵阵爽朗的笑声，这是维也纳人在对现已结束的外国占领进行报复。这一切结束以后，我们都疲倦而愉快地上床睡觉了。

我忘记了一件事：今天上午，我发现弗里茨在等着我们。

他负责党的干部工作，是个很好的老同志，对人和蔼可亲，因而很讨人喜欢。我问他党的情况怎么样，他悲痛地看着我。党员人数在不断减少；党已陷于党内宗派主义和工人们的不信任之中，因为工人们受到社会民主党人和教士的铁腕所支配。在苏军占领过的地区，情况尤其糟糕：共产党的领导人已被工人们自动赶出了工厂。不过，形势可能在好转。前几天一度罢工的电车司机已经开始认识到，他们从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得不到任何东西；相反，他们除了锁链之外，将失去一切。

我们的司机，一位西班牙战争的老战士，向我描述了这种形势，遗憾地摇头，责怪工人们忘恩负义。或许他没有认识

到，人民——还有作为人民核心的工人，这个占绝大多数的、由于遭受苦难最多因而也最健康、最敏感的部分，也憎恨任何外国人的占领，尤其是长期占领。

二月十一日

我们四点钟起床，匆匆忙忙吃完早饭便到机场去了。这是一座新的木结构大厦，它将成为一座宏伟的巨大建筑。这次，我们受到了海关的检查，我们的护照也受到审核。早些时候，这是很容易对付的：通常可以抄近路直接去苏联的机场，并且不受任何奥地利人的检查就上飞机。或许，他们通常在用望远镜监视我们，但谁都不可能进行干预和提出抗议。占领军一直拥有全权而又不担任任何责任，尽管苏联军队的行为举止一般来说还是得体的。

我们等着。一个两岁的俄国小孩由于天冷而衣着臃肿，她继蹒跚之后开始跑起来，终于跌倒却没有受伤。大家都看着她笑。甚至斯科奇马罗也停下了他那还没有向我们解释完的新“理论”，去扶起这个小女孩。他的“理论”是：共产主义社会一旦建成，政治经济学就不再存在。

我们终于离开了。

我们到达布达佩斯。在这里，我本希望找到匈牙利人亚诺什，他曾在国际纵队里战斗过，脸上有一个大伤疤，是在贾拉马战斗中负伤的结果。我原想见到他，好让他告诉我女儿在莫斯科接我。1947年3月，我从墨西哥来到这里。二十四年的流亡生活结束以后，我打算回的里雅斯特，但又茫然不知所措。那次旅行是极其混乱不堪的。为了离去，我不得不在最后时刻登上苏联的戈沃罗夫元帅号汽艇，从地处热带而酷热的墨

西哥港出发，迎着暴风骤雨，在海上航行了二十五天到达摩尔曼斯克，又乘坐了四天军用货车到达了莫斯科。两天以后，我启程去的里雅斯特。那次旅程中，我是在离这座机场不远的布达佩斯作了逗留。我终于看到了欧洲的春天，从而想起了我的青年时代。也正是那时，我才感到了回归的恬静和愉快。我丢下了在墨西哥的妻子和儿子卡洛斯。

我们在白色云海上面平稳地飞过了海拔三千公尺的喀尔巴阡山脉，于午饭时分到达利沃夫——气温在零下二十七摄氏度。

我见到了国际旅行社派来的人，但她甚至连让我们游览一下这个机场和大楼的表示都没有，而这座机场建筑风格曾经受到赫鲁晓夫的批评。她也许为此而感到羞愧。昨天，这些建筑物还是光彩的，今天却成了丢人的事！这类情况时有发生：往往一句话，一个表态就足以使某些东西失去存在的资格——竟置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于不顾了。

接着，我们经过基辅，最后到达莫斯科。我们原来认识的翻译 S 和 G 在那里迎候我们。和他们一道来的，还有政治官员 D，以及据说是负责意大利问题的 S。最后提到的这个人显然不喜欢我，也许他还记得去年五月我对待苏联代表前往贝尔格莱德的态度——那是一种不寻常的和出人意料的态度。但他仍表现得彬彬有礼，并且对我说，米高扬已去南斯拉夫，并在萨格勒布博览会上对人们拿掉一切出于斯大林手笔的东西，以及为别的一些事情而提出了抗议。不过，现在一切又平静下来了，而且关系还会不断改善。我默不作声，让他讲下去。斯科奇马罗和布格利阿尼坐在车里，也都一声不吭。我们朝着离机场三十公里的莫斯科疾驰，沿着大雪覆盖的道路在树林中穿行。我们从灯火通明的高大建筑群附近驶过。我看见了克里姆

林宫的楼塔。我们沿着高尔基大街和列宁格勒大街向行驶。我们将在苏维埃大饭店下榻。建造这座饭店所花的钱至少比所需要的钱多两倍。建筑师们更关心的是装饰和房间面积，而不大关心外形、实用性和方便性。

我被安排在四楼的一个房间里，陶里亚蒂也住在这一层，只是在往前去的一条侧廊上。这样，关照他的卫兵也就同样可以关照我。

天晓得我最初得到的印象为何这样使人感到不是滋味。我把这些想法撇到一边并且下楼到餐厅去。在这里，我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利斯特。我们是老朋友。西班牙战争是我们之间的纽带：我们自始至终在一起。我们是被许许多多热情和忧伤、欢乐和绝望的时刻联结在一起，被我们共同遇到的许许多多的危险联结在一起的。我们没有更多的话要说，而宁可彼此望着对方，也都注意到我们都增加了体重，比以前胖多了。

我们已经十七年没有见面。

餐厅里充满生气。它对公众开放，成双成对的年轻人在那里喝酒。其中有些人已有三分醉意。这里出售的所有东西都相当贵。一支管弦乐队和一位身穿白衣的金发女郎正在演唱一首令人伤感的歌曲。我仔细端详着这些我以前多次来访都不曾见过的顾客们，他们使我感到新奇。我从他们脸上看到一种寻欢作乐的欲望，一种寻求解脱和忘掉一切的愿望。也许，这些都是因为我身体疲乏和失去耐性而得到的偶然印象。

晚饭后，我很想独自一人散一会儿步。我们已离中心很远，而且天气也不太冷。我沿着楼房的一侧走去，正像我以前十分喜欢莫斯科而通常在夜间游荡的日子里所做的那样。我回忆着这一天的旅行，我的到达，S所转述的事情，我与利斯特

的会面，晚餐和跳舞的人，并且思考着明天将发生什么事。毫无疑问，在的里雅斯特发生的事情和我关于“北方风暴”的文章在这里肯定不受欢迎^①。我从莫斯科向导的表情中觉察出了这一点，他们只是在表面上对我彬彬有礼。

二月十二日

今天是星期日——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这里也是假日。但是商店则是开门的，因此人们可以去买东西，而他们也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

我晚上睡得很香。五点钟，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伴随着苏联国歌把我惊醒，因为我不曾想到自己忘记关收音机了。

吃早饭时，我又见到了利斯特——显得分外亲切。他代表团里的其他人由于长年累月的流亡生活，已经变得不大适应家庭生活了。西班牙共和国前农业部长乌里韦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副政委米赫也没有什么变化。他本应成为一个斗牛士，因为他喜欢大声讲话，爱喝法国白兰地，他那丰腴的脸上总是充满着笑容。“青年”克劳丁已经老了，但仍然是年轻人的领袖：十七年的流亡生活算不了什么，虽然他毕竟四十出头了。

我见到了一个人，看上去像意大利血统的阿根廷人科多维拉，我热情地向他打招呼。他原来是法国人科尼奥，我刚刚才认识他。握手以后我才知道我弄错了，而且发现他虽然面貌相似，但身材却不一样。科尼奥长得像单峰骆驼。我们到红场旁的国营大百货公司去买一点东西，这里人群熙来攘往，如同蚂蚁队一般。人人都在忙于采购，行囊都装得满满的。我买了一顶

^① 参看作者关于的里雅斯特的注释（见本书第 272 页）。

鹿皮帽子，因为我已经有了一顶阿斯特拉罕羔皮帽。其他人则买了更多的贵重东西。

我在红场上漫步，看了列宁陵墓。这是前来瞻仰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公民经常参拜的目标。列宁和斯大林在这儿紧挨着，列宁身穿俄式衬衫，而斯大林则身着制服。这是一种性格上以及……观点上的奇妙而鲜明的对照。这两具经过防腐处理的遗体都在灯光的照射下，这种场面与其说令人难忘，不如说使人感到阴森可怕。1927年，在这里为英国共产党书记阿瑟·麦克马纳斯以及美国共产党书记查尔斯·埃·鲁登堡（我很了解鲁登堡，我在美国时曾与他一起工作过）举行葬礼时，我瞻仰过列宁，那时这座陵墓是木质结构的。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愿意去拜谒这座陵墓了；我宁愿通过阅读列宁的著作来认识列宁。

下午我们去迎接陶里亚蒂。他是乘火车来的，路上也有许多耽搁。他应波兰党领导人的坚决请求，曾在华沙停留过。警察已把莫斯科车站包围起来，但我们可以进去，因为我们的翻译享有通行无阻的权利。陶里亚蒂来了，和他同行的是西西里地区党组织的副书记布法利尼和坎帕尼亚地区（那不勒斯）的领导人卡齐亚普奥蒂。车站上来了一大批苏联官员，其中包括什维尔尼克。我们大家亲切握手之后便返回了饭店。

我们全都聚集在陶里亚蒂的房间里吃东西，并且进行了一次密谈。他们曾想让陶里亚蒂单独住在一幢别墅里，但他拒绝了；他希望同我们住在一起。他知道，单独住到别墅去就等于完全被孤立起来，切断了同每个人的联系，而且还会受到严密的监视，连隔壁房间住的是什么人也不可能知道。这种情况以前就出现过，当时他住在曼努伊尔斯基的房间附近达一个月之久，但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没有住别墅。即使这样，他

的房间也守卫森严。整个饭店都被占领了，我们被一大队警卫和大批侍者与厨师包围起来。

我们到剧院去看小白桦舞蹈团的演出。他们的节目相当精彩。看这些节目确实是一种美的享受，有协调的舞姿，年轻的面庞和流行音乐。

然后，我打电话给我在布达佩斯的女儿。我几乎听不清她讲话的声音，她不得不大声喊着，好让我听懂。她和佛朗哥都病了。有些事情还得去做。我的小外孙长得很快。此时已是深更半夜了。透过窗户，我可以看到积雪覆盖的庭院，上面闪着亮光。风吹打着雪花，灯光也显得微弱。我想到走廊里的那批警察，想到他们在受冻以及他们脸上那种不可思议的表情，望着那空空荡荡的庭院，我脑海里闪出了坐牢的印象；我想象自己和其他人一道在庭院里来回踱步，围绕着庭院中央的圆柱兜圈子，我手背在后面，走得很慢。是浮想联翩吗？实际上，我想起了1922年1月的一个深夜，我在德国格里兹监狱的庭院里来回踱步的情景。那庭院、那灯光和我的心境，仿佛同此时此地差不多。当时我第一次离开的里雅斯特，成了政治流亡者。在意大利边界遭到三次逮捕并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迷路以后，我到了德国边界并再次被捕。我因非法入境和秘密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而被判处一个月监禁。我多服了五天徒刑，因为在教皇逝世时，我对告诉我这消息而想让我痛哭一场的监狱长说，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然后，我就被带到柏林的亚历山大普拉茨监狱。在那里我得了一场严重的传染病，最后被送往科特布斯集中营。一周以后，我在德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设法逃出了科特布斯。

代表大会后天就要举行了。谁都不谈论它，我们也没有得

到有关这次代表大会的任何材料。只有斯科奇马罗紧锁着眉头，断定这次代表大会事关重大，将要发生重大事情。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认为他并不比我们和其他来到这里的人对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二月十三日

D决定让陶里亚蒂住十三号房间。我不得不进行干预，以避免给那些害怕星期二和星期五的人造成小小的不幸。我是开玩笑地这样做的，却获得了成功。

何况今天是十三日。

早饭后，我们又去国营大百货公司，这里今天不开门。但有一个小门朝红场开着，那是对外国同志从不关闭的。布法利尼和卡齐亚普奥蒂各自买了一些东西后，我们就在城里闲逛。我看到了我已忘记的很多地方。

午饭时陶里亚蒂想同我干一杯法国白兰地。我不理解他祝酒的原因，但他却显得很风趣。赫鲁晓夫的助手在我们身旁，他故意带笑地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代表一个独立的政党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所以我不能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坐在一起。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维迪奇也将以南共联盟观察员的身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我对此未作任何计较；讨论我坐哪个席位是无用的，这将由他们决定——我毕竟是客人嘛。我不知道他们会把我安排到哪个位置。

午饭后，陶里亚蒂邀我们全体到他的房间里去。他建议把我纳入代表团并分头去访问党校和大学的学生。我和布法利尼一起被挑选到大学去。S对此肯定感到不高兴。我觉得，陶里亚蒂很理解我的处境，并且想帮助我摆脱。有时，他简直是你

意想不到的：当你万般无奈时，你总会发现他就在你身边。

这次碰头会后，我单独出去散步。天气暖和，气温为零下十摄氏度。我注意到饭店被安全人员包围起来了。有时我还发现，自己随便走走也受到监视。这是为什么呢？为的是叫我不痛快吗？在吃晚饭时，我见到了瑞士工党书记沃格（埃尔格罗·斯蒂纳）。我们是1927年在墨西哥相互认识的，我很喜欢他。他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片山潜、鲍罗廷和罗易在他之前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为墨西哥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后来才由一批画家及其报纸《砍刀报》建立起来。斯蒂纳胖胖的，满头白发。人们在所有代表大会上都能见到他，因为他总是怀着历久不衰的热情去参加这些代表大会，以便宣读瑞士同志的贺词。

餐厅里几乎是空空荡荡的。在大会期间，它只接待我们这些受到成群服务员包围的外国代表。乐队将为我们演奏，而那位体态丰满的女士也将用她那尖嗓音只为我们演唱。这里住着奥地利人（其中包括科普林尼格）、西班牙人、瑞典人、冰岛人、比利时人、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以色列人、伊朗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其他代表住在别的饭店里。这里没有集体欢庆的气氛；我们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事，只是在进出餐厅时相互打个招呼。有时，我们甚至互相都不理睬。

我想到我们往常会面时的情景：我们通常总要对最新事态发表议论，讲讲历史事件中的一些插曲，说说笑话，唱唱歌。我们往往要待到深更半夜，然后满怀着国际团结的感情上床睡觉。现在却完全没有这种情趣了。

有人对餐厅和饭店提出了批评，说它浪费材料，有多余的门和阳台，作了不必要的装饰，房间里的摆设也太多。

我们正要去离饭店不远的大厅里看电影，但是陶里亚蒂的前妻里塔想先和我谈谈。她现在和她的儿子一起住在莫斯科，但她想回意大利去。她不肯这样度过一生，而想回到她参加过运动的地方去。她处在绝望之中，她的声音在颤抖，虽然她在尽力控制自己。她儿子患有严重的神经病；她想带他到意大利或某个瑞士疗养地去，却有一些她但愿能克服的困难。我能对她说些什么呢？我谈到布达佩斯的一家诊所，那里用巴甫洛夫理论制定的方法治疗神经病，于是里塔拿定了这个主意，仿佛那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影片是新版的高尔基的《母亲》，是彩色的。我很喜欢这部影片。我还记得这座电影院，因为大约三十年前我曾到过这里；它就是电影宫，那时我是应米夏诺的邀请来参观的。在这里，我见到了德国人明岑伯格。米夏诺因病去世了，否则他也会在某次清洗中被搞掉。他的亲属住在莫斯科。他是一个好同志，既积极又能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掉队了，因此受到法西斯分子的迫害。他在卡尔·李卜克内西身边参加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明岑伯格。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就发现明岑伯格死在巴黎附近的一个树林里，吊在一棵树上。他是在被谴责犯有托洛茨基主义错误并拒绝去苏联以后，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的。他工作能力很强，积极性颇高；他在伦敦组织了反对希特勒的“季米洛夫审讯”。希特勒对他恨之入骨。明岑伯格是个怪人，他与各个阶层的人都有联系，从反法西斯人士到间谍，从共产党领导人到政府部长。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对他评价甚高，因为他在瑞士时曾和列宁在一起，当时他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国际的书记，并使这个组织接受刚刚诞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

我回到房间看完了涅克拉索夫写的《故乡》一书。我很喜欢这本书；它带有真实感情，富有朝气，独具匠心，展现了一幅当代苏联生活、苏联人民的忧患与渴望的画面。作者主要是谴责对无辜者的迫害，他们曾被监禁在德国的集中营里，但回到故土却发现自己又被关进了集中营，在那里接受“再教育”！长期以来，被赶到德国去过的人无不被看作懦夫和敌人；这不仅是在贝利亚的“理论”，也是其支持者或纵容者的“理论”。

代表大会就在明天。我们将在对前景一无所知的状态下前赴会。我们甚至不了解赫鲁晓夫报告的要点。这就像人们第一天进学堂一样。我们并不比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人了解更多的情况。也许这里不会有什么新情况发生，尽管斯科奇马罗认定会发生，而且硬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代表大会。

二月十四日

我们一大早就起床了。八点半钟，我们出发去克里姆林宫，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就在这里举行。组织和安全工作搞得非常高明，使任何人都未能觉察出来，而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些向我们指路的交通民警。外国代表们进一个入口，俄国人进另一个入口，而苏联领导人则单独走又一个入口。我们进入以前，我注意到鲜艳的红旗飘扬在克里姆林宫的中央圆顶上。这是列宁生前的愿望，而从那时起，红旗就在这里日夜招展，夜间则用灯光照耀着。对我来说，这历来是莫斯科最喜人的一幅图画。我想到这面鲜艳而光荣的旗帜是如何出现在这个先前的禁地的，它是靠了数世纪的斗争，由各民族男女老幼以遭到监禁、折磨和屠杀作代价，千百万人民作出了牺牲才得来的。

走廊里挤满了人。突然，我看到了多洛雷斯——“热情之